

东西差距还是南北差距? ——1978 年以来中国区域差距的演变与机理分析

安树伟^{1,2}, 李瑞鹏³

-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70;
2. 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模拟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70;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1978—2021 年, 中国区域绝对差距一直是扩大的, 而相对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基本稳定 4 个阶段。中国的东西差距一直大于南北差距, 2013 年以来扭转的南北差距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区域差距是资源禀赋、区域战略与政策、要素流动、市场需求、市场化水平和文化传统等多因素作用的结果, 未来中国需要精准的区域政策以调控区域差距。

关键词:区域总体差距; 东西差距; 南北差距; 演变机理

中图分类号:F061.5; 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3)04-0109-12

East-west disparity or north-south disparity: 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 since 1978

AN Shuwei^{1,2}, LI Ruipeng³

- (1. 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Megareg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imulation, Beijing 100070, China;
3.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From 1978 to 2021, the absolute disparity in China has been expanding, while the relative disparity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first narrowing, then widening, then narrowing and basically stable.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has always been greater than that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turned North-South disparity since 2013 needs to be taken seriously. The regional disparity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in China, including resource endowment, regional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factor flow, market demand, marketization leve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In the future, China requires precise regional policies to regulate regional disparities.

Key words: regional disparity; east-west disparity; north-south disparity; evolution mechanism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总体实现了较快的增长, 1978—2021 年, 中国 GDP 从 3 678.7 亿元增
加至 1 143 670.0 亿元, 人均 GDP 从 385 元增加至 80 976 元, 已经成功跨入全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

收稿日期: 2022-11-04 修回日期: 2023-02-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区域战略实施效果综合评估与政策优化研究”(22AJL003)。

作者简介: 安树伟(1969—), 男, 山西沁县人, 经济学博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通信作者: 李瑞鹏。

列。中国经济过去 40 多年是繁荣的,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差距始终存在。以省际差距而论,1978 年人均 GDP 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贵州的 14.20 倍,2021 年最高的北京是最低的甘肃的 4.48 倍。缩小区域差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区域差距过大是不平衡发展的重要表现。本文旨在深入分析 1978 年以来中国区域差距的基本特征、演变阶段及演变机理。共分 5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是区域差距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是中国区域相对差距的演变,第四部分是中国区域差距演变的机理,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含义。

一、研究综述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学术界对于中国区域差距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主要集中在区域差距的测度及原因分析。

(一)关于中国区域差距的测度

学术界在研究时点、指标选择、测度方法、空间尺度等方面选取的不同,对中国区域差距的测度结果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研究的时间起点多数为 1952 年或 1978 年。关于指标选择,早期使用人均 GNP(或者人均 GDP),辅以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人力资本等指标进行分析,仅有少部分研究使用 GDP。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统计指标,使用变异系数(CV)、加权变异系数(LCV)、基尼系数(Gini)、泰尔指数(TEI)等方法测度;另一种是基于经济增长,使用计量模型估计考察初始人均 GDP 或人均收入及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来判断各地区之间是否收敛。区域差距的空间尺度有省级、地市级和县级 3 种。一般而言,空间尺度越小,区域差距越显著^[1-2]。从测度结果来看,关于省际差距较为一致的观点是:1952—1978 年呈扩大趋势,1978—1990 年呈缩小趋势,1991—2000 年呈扩大趋势,2001 年以来又有所缩小。而王欣亮等^[3]认为,2000—2012 年,中国省际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并未呈现出收敛的态势,仍处于发散状态。此外,学术界更多的是关注三大地带、四大区域、省域内部、八大区域^[4-7]的差距。

近年来,南北差距日益成为新的关注点,学者

在探讨南北差距演变特征的基础上,从南北差距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发展指数、增长极^[9-11]等视角分析了南北差距扩大问题。但白冰等^[12]认为,南北区域经济呈现明显的空间融合一体化发展的态势。

(二)关于区域差距的原因

学术界关于区域差距原因的研究,主要有以下 5 种因素:一是自然地理环境。付金存等^[13]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认为“第一自然”差异是中国区域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第二自然”差异则进一步强化了区域差距。传统经济地理学界持这种观点比较多。二是要素投入。郭金龙等^[14]认为资本流动是影响区域差距的重要因素;魏后凯^[15]认为 1985—1999 年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 GDP 增长率的差异,约有 90% 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唐兆涵等^[16]从技术引进视角,认为包括劳动和资本在内的要素在利润驱动下的单向流动是区域差距形成的动因。三是制度因素。李金叶等^[17]从政治—经济视角,认为区域差距的形成与扩大是复杂的政治经济权衡;黄晖^[18]则认为制度是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各区域市场化进展的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扩大。四是区域发展战略。谢安世^[19]指出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更为根本的是区域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问题。五是综合因素。多数学者认为形成中国区域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含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国家区域政策、要素投入、制度、经济结构、全球经济状况等^[20-22]。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区域差距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仍存在以下 3 个方面不足:一是大多数研究是基于不同的地理空间测度中国区域差距演变,比如首先按照三大地带、四大区域以及南北方的划分,再研究区域差距。这种研究视角忽视了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并不能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区域差异。二是割裂了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的关系。区域差距的变化是有阶段性的,既有绝对差距的变化,也有相对差距的变化,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三是对于区域差距原因的阐述大多是单因素分析,即使多因素研究尚没有形成一个总体分

析框架。因此,本文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通过区域差距的测度并结合经济重心移动,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的区域差距究竟是东西差距?还是南北差距?以及差距产生的原因,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二、中国区域差距的基本特征

本文使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GDP(以1978年为基期,下同)的极差和标准差衡量中国区

域经济绝对差距,使用人均GDP之差衡量东西部、南北方^①的绝对差距,得到1978—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的绝对差距(见图1)。使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GDP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衡量中国区域相对差距,使用人均GDP(现价,下同)之比衡量东西部、南北方相对差距,计算得到1978—2021年中国的区域经济相对差距(见图2)。概括来讲,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具有如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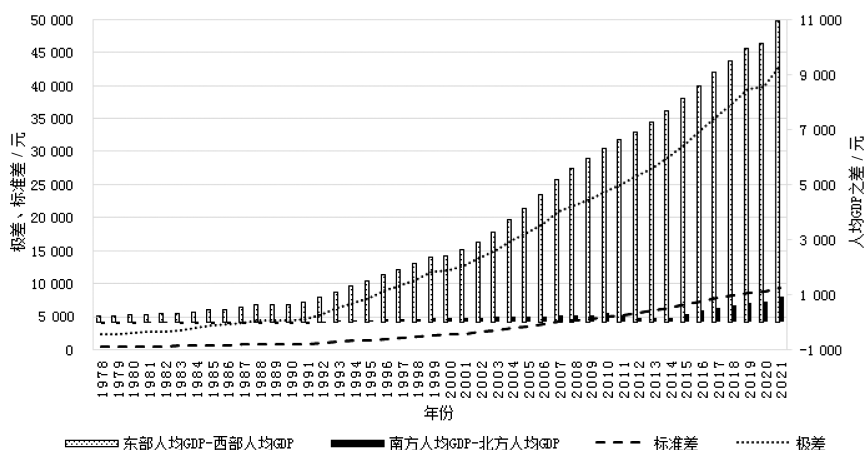


图1 1978—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绝对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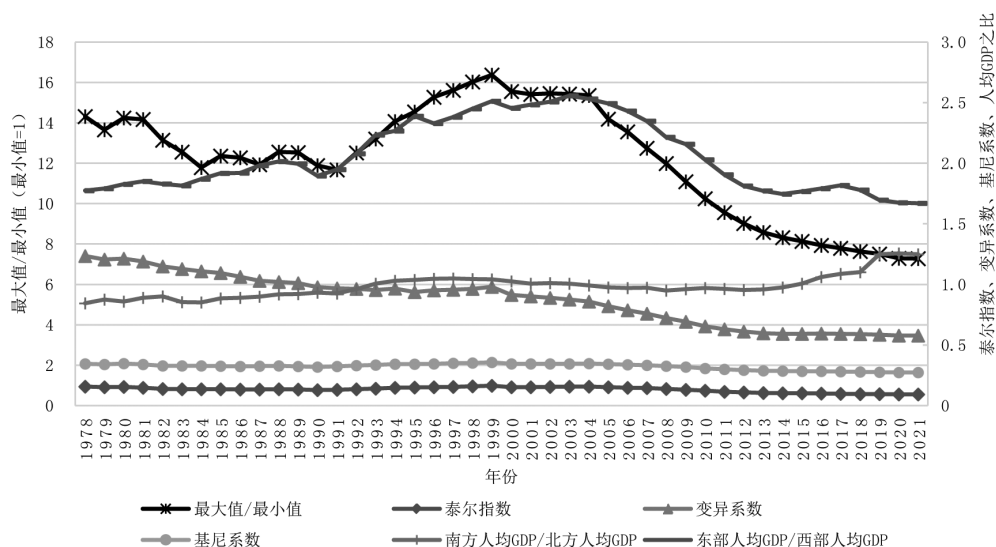


图2 1978—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相对差距

资料来源:同图1。

① 本文关于我国东西部划分采用四大区域方案,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共10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2个省份。我国南北方划分基本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南方包括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江西、福建、广东、海南、西藏,共16个省份;北方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新疆、河北、甘肃、宁夏、山西、陕西、青海、山东、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共15个省份。

(一) 绝对差距持续扩大, 但相对差距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1978 年以来, 中国区域绝对差距不断扩大, 而相对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基本稳定四个阶段。从绝对差距看, 1978—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的极差、标准差分别由 2 310.4 元、447.4 元增加至 43 056.5 元、9 427.1 元, 区域绝对差距在持续增大。从相对差距看, 1978—2021 年, 中国人均 GDP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分别由 14.31:1、1.23、0.156 和 0.345 降低至 7.28:1、0.58、0.093 和 0.273。2013 年以来,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下降幅度逐步变缓。分阶段来看, 1978—1991 年, 中国人均 GDP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在波动中不断下降, 1992—1999 年不断增加, 并达到最大值 16.37:1, 2000 年以后持续下降; 1978—1995 年, 变异系数不断下降, 1996—1999 年略有增加, 2000 年以后不断下降; 1978—1990 年, 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均呈下降趋势, 1991—1999 年略有增加并分别达到最大值 0.163、0.357, 2000 年以后呈现出先小幅上升、后持续下降的趋势。

每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周期内至少经历经济增长起步、快速增长、增速减缓 3 个阶段^[23]。起初, 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率大于欠发达地区, 二者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在增加; 随着发达地区增长率开始下降, 欠发达地区增长率上升, 且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率超过发达地区时, 绝对差距持续增加, 但相对差距开始缩小; 当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到一定程度时, 二者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开始缩小。因此, 区域差距的变化相应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 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同时扩大阶段; 第二阶段, 绝对差距扩大、相对差距缩小阶段; 第三阶段, 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同时缩小阶段(见图 3)。对照图 1~图 3 可以发现, 1978—1999 年中国区域总体差距处于第一阶段, 1999—2021 年处于第二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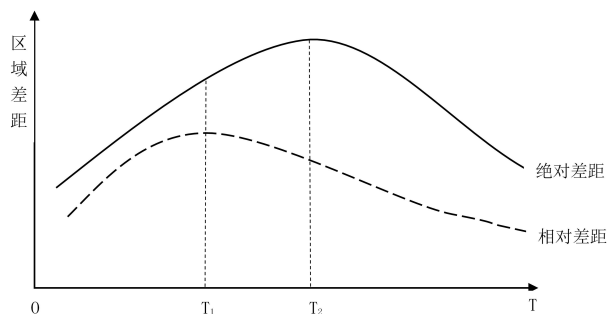


图 3 区域差距的 3 个阶段

(二) 东西差距大于南北差距, 且二者处于不同阶段

1978—2021 年, 无论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 中国东西差距一直大于南北差距, 即中国区域差距更多表现为东西差距。从绝对差距看, 1978—2021 年东西部人均 GDP 差距从 203.0 元增加到 10 946.4 元, 扩大了 52.9 倍。同期, 南北方人均 GDP 差距则经历了从缩小到扩大的过程, 1978 年南北方差距为 -61.8 元, 南方落后于北方; 1993 年南方开始超过北方, 之后南北方发展差距开始拉大, 到 2021 年扩大到 931.9 元。2021 年东西部人均 GDP 差距是南北方差距的 11.7 倍。从相对差距看, 2003 年之前东西部相对差距处于持续扩大阶段, 2003 年之后迅速缩小; 1978—1993 年南北方相对差距逐步缩小, 1994—2013 年基本稳定, 2014 年之后迅速扩大。东西部相对差距与南北方相对差距之差的最大值出现在 2003 年, 2003 年之后二者差距迅速缩小。这表明, 以 2003 年为界东西部差距已经进入了区域差距变化的第二阶段; 1993 年之前南方人均 GDP 落后于北方, 二者差距不断缩小; 1993 年之后南北方差距以南方人均 GDP 超过北方为标志, 进入了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同时扩大的阶段。

(三) 经济重心变动与区域差距具有高度一致性

以各省份人均 GDP(以 1978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为权重, 以各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②的经纬度为各省份的地理坐标, 借鉴周民良^[24]的研究, 计

② 鉴于 2019 年北京市政府搬迁至通州, 文中仍以天安门的经纬度坐标作为北京市的地理坐标。

算得到 1978—2021 年中国区域经济的重心变动趋势(见图 4)。区域经济重心向某一方向移动,意味着这个方向的区域经济发展速度更快。1978 年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重心一直在河南范围内移动,总体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西南的移动趋势。分阶段来看,1978—1999 年,中国区域经济重心的主要变动方向为由北向南,尤其是 1991—1995 年,说明该时期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0—2013 年,重心的主要变动方向是由东向西,说明该时期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2014—2021 年,重心的主要变动方向是南偏西,说明南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快,由此影响到中国区域差距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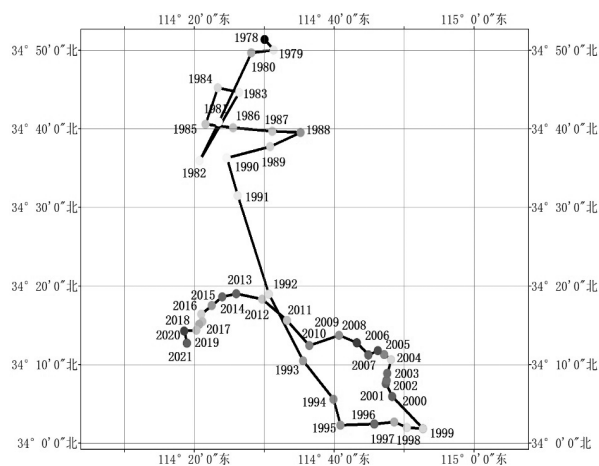


图 4 1978—2021 年中国区域经济重心变化

三、中国区域相对差距的演变

下面依据区域相对差距变化并结合经济重心移动,具体分析中国区域相对差距演变的阶段。

(一) 东西差距有所扩大、南北差距缩小、区域总体差距缩小阶段(1978—1990 年)

1978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北强南弱”的局面,全国 31 个省份的人均 GDP 前 10 位的省份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江苏、青海、吉林、西藏、广东。其中,北方有 6 个,东北三省均在前 10 位;居后 10 位的省份有贵州、广西、云南、河南、安徽、重庆、四川、福建、江西、湖南,北方省份仅有河南。1978 年中国南北方人均 GDP 差距为 0.84:1,东西部差距为 1.77:1。1978—1990 年,中国人均 GDP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变异系

数、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分别从 14.313:1、1.234、0.156 和 0.345 下降至 11.884:1、0.978、0.128 和 0.319,区域差距总体在不断缩小。该时期,南方尤其是沿海省份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1978—1990 年,中国经济重心总体由北向南移动(1985—1988 年显著向东移动),这意味着区域差距缩小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区域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向。到 1990 年,南北方人均 GDP 差距缩小为 0.93:1,逐渐改变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强南弱”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同时东西部人均 GDP 差距逐步扩大到 1.90:1。南北差距的缩小和东西差距的扩大使得中国的总体区域差距有所缩小。

(二) 东南—西北差距迅速扩大、区域总体差距扩大阶段(1991—1999 年)

1991—1999 年,中国人均 GDP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在波动中分别从 11.672:1、0.968、0.130 和 0.324 增加至 16.371:1、0.979、0.163 和 0.357,表明中国区域总体差距不断扩大。这一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省份的年均人均 GDP 增长率显著高于西北地区省份,人均 GDP 增长率前 10 位的省份全部位于东南地区。1991—1999 年,中国经济重心由西北方向东南方向大幅度移动,尤其是 1991—1995 年移动幅度很大,这意味着我国区域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东南—西北方向上。这一阶段,中国东南—西北人均 GDP 差距由 1.17:1 迅速扩大到 1.45:1,从而使得中国总体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在东南—西北差距迅速扩大过程中,以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契机南方经济快速发展,1993 年南北方人均 GDP 之比为 1.01:1,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区域“北强南弱”的格局。

(三) 东西差距迅速缩小、南北差距基本稳定、区域总体差距缩小阶段(2000—2013 年)

2000—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分别由 15.548:1、0.914、0.152 和 0.344 下降至 8.572:1、0.598、0.105 和 0.287,说明区域总体差距不断缩

小。这一时期,位于中国近西部地区^③的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的人均 GDP 年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他省份,其中内蒙古高达 15.61%。2000 年,中国人均 GDP 前 10 位的省份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辽宁、福建、山东、河北,除辽宁外全部位于东部地区;居后 10 位的分别是河南、四川、安徽、宁夏、江西、湖南、青海、云南、广西、贵州,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东强、中西弱”的特征。2000—2013 年,中国的区域经济重心由东向西偏北大大幅度移动,这意味着区域差距缩小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向上。这一时期,中国东西部地区人均 GDP 差距由 2.45:1 迅速缩小到 1.77:1,南北差距由 1.03:1 变动到 0.96:1。由此可见,2000—2013 年,中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近西部地区的省份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区域总体差距明显缩小。

(四) 东西差距缩小、南北差距扭转、区域总体差距较为稳定阶段(2014—2021 年)

2014—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分别从 8.316:1、0.592、0.102 和 0.285 缓慢下降至 7.282:1、0.577、0.093 和 0.273。这一时期,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北方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前 10 位的省份除黑龙江外均为南方省份;居后 10 位的省份分别是山西、宁夏、青海、广西、海南、内蒙古、浙江、广东、新疆、辽宁,南方省份仅有 3 个,即海南、浙江和广东。2014—2021 年,尤其是东北地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由 8.39% 迅速下降至 4.90%,年均下降 0.50 个百分点;即使作为区域重大战略的京津冀,其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由 9.71% 下降至 8.47%。这一时期,南方经济发展显著超过北方,表现为 2014 年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由东北向西南大幅度移动,区域差距扩大的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上。2014—2021 年,中国南北方人均 GDP 差距由 0.97:1 扩大到 1.25:1,而东西部之间差距由 1.75:1 缩小到 1.67:1。南北差距的扩大叠加了东西差距的缩小,并没有导致中

国区域总体差距出现明显变化。

四、中国区域差距演变的机理

中国区域差距的演变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下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多因素的区域差距分析框架(见图 5),以解释中国区域差距演变的机理。其中,自然禀赋是影响区域差距的初始因素,自然禀赋既可以通过影响自然资源投入影响地区发展,也可以通过区位、舒适度、地貌等影响要素流动,满足各地市场需求,进而影响地区发展^[25],自然禀赋也是区域战略与政策必须考虑的因素。区域战略与政策是影响中国区域差距的关键因素,我国区域政策的出台适应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21],政策目标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转向兼顾效率与公平 3 个阶段。区域战略和政策还可以改变市场需求,通过市场化改革完善经济体制,促使生产要素的流动^[26]。要素流动和市场需求是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叠加因素,二者的变化也会使政府政策和战略作出相应的调整。市场化水平、交通条件和文化传统是影响中国区域差距的环境因素^[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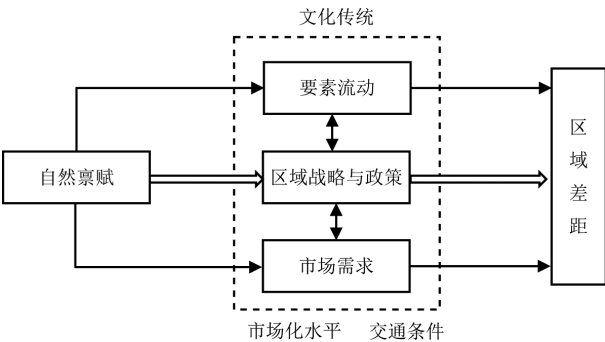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区域差距演变的机理

(一) 自然禀赋是影响中国区域差距的初始因素

自然禀赋是影响中国区域差距的初始因素。中国区域差距演变的四个阶段,都有自然禀赋的作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以第一和第二阶梯的地貌为地理基础,高原、盆地和山区面积广,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地下资源丰富,而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主要是在第三阶梯的地理基础上形

^③ 指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重庆、四川、贵州、广西。

成的,以平原为主^[27],使我国经济和人口分布总体呈现“东南密西北疏”的格局。与北方相比,南方能源矿产等资源较少,但气候条件优越,拥有便利的海运和长江、珠江内河航运优势。正是由于自然禀赋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无论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1978—2021年中国经济的东西部差距总体高于南北方差距,但2003年以来二者差距已经缩小(见图1、图2)。1978—2000年,良好的区位和交通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乃至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重点承接地的必要前提,这导致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2000年以来,凭借便利的海运东部沿海地区更广泛参与全球分工,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区域经济持续发展。而中西部地区能源矿产资源富集,水、电、土地等要素成本低,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纺织、化工、冶金、电力等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必要条件。需要说明的是,自然禀赋作用的发挥受区域战略与政策、要素流动、市场需求、市场化水平、交通条件、文化传统等影响,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自然禀赋对区域差距的影响在逐渐降低。

(二)区域战略与政策是影响中国区域差距的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区域战略和政策,成为影响中国区域差距的关键因素。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等北方地区能源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整体高于南方,1978年北方人均GDP是南方的1.18倍。1978—1990年,政府的目标取向是效率优先,实施向沿海倾斜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六五”时期,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区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七五”时期,设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和海南特区。这些政策使得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南方省份的经济快速发展。1991—1999年,中央政府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目标开始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九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战略转变,开始采取促进中西部发展的战略措施。但是,由于政府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政策支援力度有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各种经济要素继续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聚^[27]。因此,东部地区的潜力被进一步释放,福建的经济增速跃居全国首位,山东、上海、河北、天津等沿海省份经济增速提升,这也使中国形成“东南强、西北弱”的区域经济格局。2000年以来,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兼顾效率与公平,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逐步成形。“九五”时期末,国家加大了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鼓励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加强了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28]。“十五”至“十一五”时期,国家继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共十八大以来,又相继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同时,积极培育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天水经济区和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和中原城市群等中西部经济区和城市群,并先后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8个国家级新区和8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对于促进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等中西部地区省份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5年,面对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低迷,为解决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使得以钢铁、化工、建材、能源产业为重点的北方地区经济发展受到显著影响,南北经济差距由此迅速扩大。

(三)要素流动和市场需求是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叠加因素

要素流动也影响到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要素流动方向也是区域差距的晴雨表。1978—2000年,受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区域政策向沿海倾斜的影响,东部地区吸引了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劳动力以及国内外的资本流入。截至2000年,中国跨省流动劳动力(外出半年以上)中90%来自中西部地区,其中82%流向东部地区。最主要的劳动力流入地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江苏,除北京外均在东南沿海地区,其中流入广东的

劳动力占全国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总数的一半^[29],这也是东南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进入 21 世纪,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西部大开发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转移加快,从而使中西部地区较快速发展。而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也使得这一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影响。根据第四次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90—2020 年南方比北方的省外流入人口数分别多 47.4 万人、2 046.8 万人、3 955.8 万人和 5 348.0 万人,说明进入 21 世纪以来南方省份的人口流入更加明显,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省外流入人口占全国 31 省份(不含港澳台及西藏)外省流入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尤其是 2010 年以来,南方省份吸引了更多劳动力流入。使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城区人口和城区暂住人口之和衡量计算城市城区常住人口,2010—2021 年中国共有 122 个城市^④出现收缩,收缩城市主要为东北地区的资源型枯竭型煤炭、森工城市,占收缩城市数量的 41.0%。

从资本流动角度看,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和吸引外资也较好地反映了区域差距的变化。1978—1990 年,国家的投资布局重点东移,东部地区 and 中西部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 19.79% 和 16.46%。1979 年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开始超过中西部地区。1991—1999 年,资本向东部加速集聚,东部地区 and 中西部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5.65% 和 23.03%,这也是东西部经济差距持续拉大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1996 年以来,国家的投资布局已经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开始下降。此外,1983—1991 年,东部地区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集聚地,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 90.6%^[30]。2000 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基础性、公共事业建设方面投入了大规模资金。尤其是西部地区,持续开展了交通基础设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批标志性工程项目。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不断完善,加之东部要素成本的上升和国家政策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和沿海企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2009 年中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开始超过东部地区。1978—1995 年,南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由 45.4% 增加到 62.4%,到 2012 年持续下降到 52.4%,2021 年又持续上升到 63.9%,这与图 2 显示的南北方人均 GDP 差距的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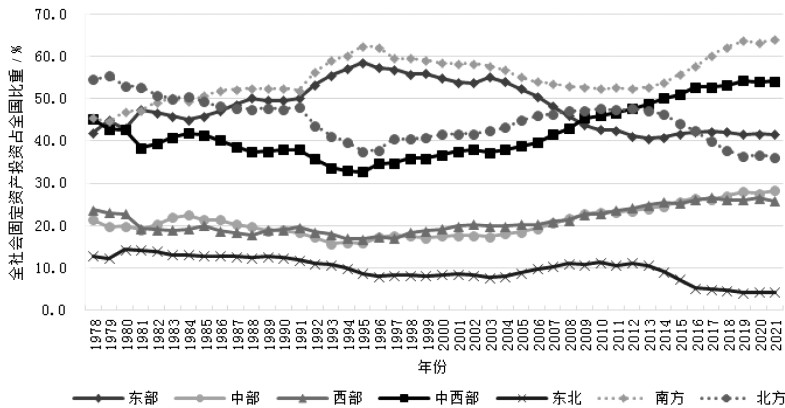


图 6 1978—2021 年中国四大区域、南北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

注:由于我国分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于 2017 年之后不再公布,2018 年及以后的数据是根据相关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增长速度计算得到。

资料来源:同图 1。

④ 与 2010 年城市相比,2021 年有新设立的县级市,本文以 2010 年城市为准。

市场需求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挑剔的市场需求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条件的变动不仅会刺激生产要素的创造、提升与发展,还会引起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东部地区毗邻国际市场,中西部地区潜藏着巨大的国内市场^[26]。2000年以前,较好的国际市场为中国扩大出口提供了机遇。1978—1990年,以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区位优势和国家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抓住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机遇,不仅加速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同时也吸引了国外投资,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了“东南快、西北慢”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市场需求持续疲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受到了严重影响,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使得东西部差距逐步缩小。从国内市场来看,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国内市场持续低迷,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着眼于中西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在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纺织、化工、冶金、电力等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传统行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使得2000—2012年中国近西部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2013年以来,受国外市场低迷和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钢铁、能源、建材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影响尤为突出,从而明显影响到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南北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开始扩大。

(四) 市场化水平、交通条件和传统文化是影响中国区域差距的环境因素

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过程,

市场化水平成为影响中国区域差距的环境因素。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得到承认。市场化进程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体制的变革。樊纲等^[31]的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五方面。1997—2007年,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1.45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39.2%是由市场化贡献的^[32]。测算了1997—2019年中国除港澳台及西藏之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市场化指数和GDP年均增长率,发现二者具有一定的正向关系(见图7)。同期,我国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整体较高,南方的市场化水平显著高于北方,年均经济增长率也相对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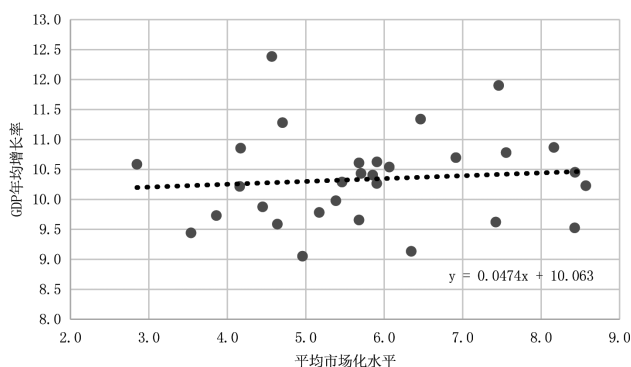


图7 199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平均市场化指数和GDP(1978年为基期)年均增长率

市场化水平的提升,生产要素流动性显著增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区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辽东半岛到广西沿海一线涌现了已经初步形成经济具有很强活力的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首先在沿海地区形成^[33],先后出现了典型的珠江模式、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南方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而北方在重化工业需求拉动下通过资本等要素投入仍保持了较长时期辉煌,但也导致了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营商环境相对较差的结果。2013年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东南地区因日益发育的市场机制快速出清过

剩产能,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南方内陆省份依托长江等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近年来贵州、江西、重庆、云南等省份经济增速持续领先全国,中国形成了“南快北慢”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

在要素流动过程中,良好的交通条件降低了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增强了城市可达性,促进了要素的流动,影响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不同程度地弥补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自然禀赋所带来的区域劣势。覃成林等^[34]认为西部地区高铁的开通促进了铁路沿线城市间的经济交流,缩小了经济差距。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持续增加,交通体系逐渐网络化对于缩小东西差距具有重要作用。

文化传统并不会直接影响区域发展差距,但可以通过其他因素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开始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35-36]。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率先从广东、福建开始的改革开放就与岭南文化与闽越文化有很大关系。同样地,1978 年以来东北地区在重要时间节点上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也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关^[37]。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含义

(一) 研究结论

根据前文对于中国区域差距的基本特征、中国区域相对差距的演变、中国区域差距演变机理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 3 点结论。

第一,中国区域差距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78—2021 年,中国区域绝对差距一直是扩大的,而相对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基本稳定的过程。结合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中国区域相对差距可以明确划分为 4 个阶段:东西差距有所扩大、南北差距缩小、区域总体差距缩小的阶段,东南—西北差距迅速扩大、区域总体差距扩大的阶段,东西差距迅速缩小、南北差距基本稳定、区域总体差距缩小的阶段,东西差距缩小、南北差距扭转、区域总体差距较为稳定的阶段。1978—2021 年,无论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东西差距一直大于南北差距。2013 年以来,中国南北差距根

本扭转,且差距扩大态势日益明显。

第二,中国区域差距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自然禀赋是影响中国区域差距的初始因素,区域战略与政策是关键因素,要素流动和市场需求是叠加因素,市场化水平、交通条件和文化传统是环境因素。他们既可单独发生作用,又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中国的区域差距。

第三,中国在还没有妥善解决东西差距的同时,又面临着扭转的南北差距的挑战。1978 年至今,东西差距是中国区域差距的主要方面,东西差距已经进入了绝对差距扩大、相对差距缩小的阶段,顺利进入第三个阶段仍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问题是在东西差距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同时,中国又面临着根本扭转和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产生的原因有较大的不同,未来中国既要解决东西差距问题,又要考虑解决南北差距问题,这就需要精准的区域政策相配套。

(二) 政策含义

中国的区域差距直接关系到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含义。

第一,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要转向东西协调与南北平衡并重。中国区域差距变动是一个动态过程,由于自然禀赋、区域战略与政策等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程度不同,区域差距变化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不同方向上。过去中国的区域政策着重解决东西差距,随着东西相对差距的快速缩小,需要关注南北差距问题,尤其是对涉及北方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适时进行必要调整。加大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北方地区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持力度。

第二,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寻求解决区域差距的途径。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东部地区要实施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对外开放空间格局,融入国际大循环,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中西部地区、东北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扩大内需的主要区域,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坚持宜(城市)群则(城市)群、宜(都市)圈则(都市)圈,通过构建“城市群+都市圈+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市化空间格局,释放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蕴含的内需潜力。其中,成渝地区等经济基础好、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应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城市群;中部地区的长沙、武汉、合肥、郑州、太原,西部地区的西安、昆明、南宁、乌鲁木齐,东北地区的长春、大连、沈阳、哈尔滨要以都市圈为主体形态促进发展。在都市圈和城市群之外加快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促进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38]。

第三,着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道路还没有完成,经济可持续增长有赖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32]。市场发育程度不同是近年来中国南北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缩小南北差距需要大力推动北方地区的市场化改革。一是完善市场运行机制,特别注重推动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关键性领域的实质性改革与建设。二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要打破行业垄断,实现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竞争^[8]。三是科学界定政府作用边界,把本属于市场的作用和功能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来,有效调动市场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四是要转变政府对区域经济的调控手段。区域经济的调控手段以行政手段为主逐渐转向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以保证区域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39]。

参考文献:

- [1] 贺灿飞,梁进社.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变化:市场化、全球化与城市化[J]. 管理世界,2004(8):8-17,155.
- [2] 周杰文.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尺度效应分析[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0.
- [3] 王欣亮,严汉平,刘飞.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时间演进及空间机制分解:1952-2012[J]. 当代经济科学,2014,36(3):1-10,124.
- [4] 彭文斌,刘友金. 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J]. 经济地理,2010,30(4):574-578.
- [5] 王选选. 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分析[J]. 财贸经济,2009(11):131-135.
- [6] 安虎森,张古. 中国发达省份内部发展差距的理论解释与对策——以山东、广东和江苏为例[J]. 现代经济探讨,2015(6):17-22.
- [7] 汤学兵,陈秀山. 我国八大区域的经济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106-113.
- [8] 盛来运,郑鑫,周平等. 我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J]. 管理世界,2018,34(9):16-24.
- [9] 邓忠奇,高廷帆,朱峰. 地区差距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期叠加”下的内生增长[J]. 经济研究,2020,55(10):22-37.
- [10] 许宪春,雷泽坤,窦园园,等. 中国南北平衡发展差距研究——基于“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综合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21(2):5-22.
- [11] 杜宇,吴传清.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成因与对策[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4(1):148-156.
- [12] 白冰,赵作权,张佩. 中国南北区域经济空间融合发展的趋势与布局[J]. 经济地理,2021,41(2):1-10.
- [13] 付金存,赵洪宝,李豫新. 新经济地理理论视域下地区差距的形成机制及政策启示[J]. 经济体制改革,2014(5):43-47.
- [14] 郭金龙,王宏伟. 中国区域间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研究[J]. 管理世界,2003(7):45-58.
- [15] 魏后凯.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2(4):19-26,92-93.
- [16] 唐兆涵,陈璋. 区域经济差距的形成动因、演变路径和发展趋势——基于技术引进视角的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19(2):46-57.
- [17] 李金叶,周耀治. 基于政治—经济视界的我国区域差距解析[J]. 贵州社会科学,2012(1):46-51.
- [18] 黄晖. 中国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制度分析[J]. 经济地理,2013,33(1):35-40.
- [19] 谢安世.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理论根源与对策思路[J]. 理论月刊,2017(3):141-148.
- [20] 陈秀山,徐瑛. 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04(5):117-129,207.
- [21] 张红梅,李善同,许召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差距的演变[J]. 改革,2019(4):78-87.
- [22] 李国平,孙瑀,朱婷. “十四五”时期优化我国经济空间结构的若干对策建议[J]. 改革,2020(8):30-45.

- [23] 安树伟,熊雪如. 区域增长接力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稳增长吗?——基于全国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20(2):82-93.
- [24] 周民良. 经济重心、区域差距与协调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2000(2):42-53,206.
- [25] 苏红键. 自然禀赋与地区发展:兼论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J]. 中国软科学,2022(10):61-71.
- [26] 安树伟,常瑞祥. 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传递及其机制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16(11):74-83.
- [27] 孙久文,闫昊生. 中国经济地理概论[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8-34.
- [28] 孙久文,李恒森. 我国区域经济演进轨迹及其总体趋势[J]. 改革,2017(7):18-29.
- [29] 王小鲁,樊纲. 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 经济研究,2004(1):33-44.
- [30] 陆大道等. 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21.
- [31]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9 年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257.
- [32]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2011,46(9):4-16.
- [33] 吴敬琏.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80.
- [34] 覃成林,贾善铭,种照辉,等. 高速铁路驱动的中国区域经济[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53-92.
- [35] 林建浩,赵子乐. 均衡发展的隐形壁垒:方言、制度与技术扩散[J]. 经济研究,2017,52(9):182-197.
- [36] 李楠,林友宏. 族群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基于基因和姓氏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19(3):44-58.
- [37] 安树伟,李瑞鹏.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东北振兴的战略选择[J]. 改革,2018(7):64-74.
- [38] 邬晓霞,安树伟. 中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识别与发展方向[J]. 改革,2022(10):133-143.
- [39] 安树伟,肖金成. 区域发展新空间的逻辑演进[J]. 改革,2016(8):45-53.

(本文责编:王延芳)